

统计研究

第 4 辑



中国统计出版社

统 计 研 究

第 4 辑

中国统计学会《统计研究》编辑组 主编

中 国 统 计 出 版 社

60381/52

统 计 研 究

第 4 辑

中国统计学会《统计研究》编辑组 主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家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frac{1}{8}$ 印张 1插页 150,000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 4006·011

定价: 0.75元

目 录

谈谈统计的一些问题	于光远 (1)
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国民收入和国 民生产总值的讨论	孙冶方 (19)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 劳动划分问题的探讨	杨坚白 (40)
论建立健全我国国民经济平衡统计核算体系	黄 海 (55)
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几个问题的探讨	方秉铸 (74)
地区综合平衡统计研究初探	熊玉柏 肖端清 (95)
吸收新SNA的长处, 建立我国的国民经济平 衡帐户体系	钱伯海 (122)
关于统计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冯杞靖 (135)
统计理论基本问题	黄良文 (172)
试论统计的计算与监督	杨友仑 傅守仁 (196)
第二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纪要	(208)

谈谈统计的一些问题

——1981年5月27日在第二次全国
统计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根据录音整理)

于光远

今天的大会，我没办法去了。李成瑞同志说，给我录个音。听说你们也给孙冶方同志录了音。好吧，这倒是个现代化的开会方法，可以克服空间的——距离的困难。

最近我倒考虑了一下统计学的问题。这是因为我答应到北京市统计学会去做一次报告，已欠了很长久的帐了。我请他们给我找一些统计书，他们给我找来了这一本书（按：指《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这本书写得不错，我学了一点。我还请商务印书馆给我查一下百科全书，看看世界各国的百科全书对统计这条是怎么写的。我手边有两本韦伯斯特大词典，一本是1916年版的，一本是1961年版的。我还有一本德文的大词书。可是我想查找的百科全书中的统计条目，现在还没有查回来。我想考虑统计的一些基本概念。看了一些书，也想了一些问题，信手写了一点东西，可是材料没有搜集全。所以虽然想做一些研究工作，想研究好了到北京市统计学会去讲，可是这个工作没有作完。你们这个会又马上就要开了，因此我还不能系统地把我的想法整理出来，只好请

你们原谅了。

我想先说一说，我对统计这个概念的理解。

什么叫统计？在这里我讲的统计当然是社会经济统计。统计现在又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从数学方面讲统计现在有大量著作。它的应用很广泛，如应用在物理学中，在物理学中有统计物理这一门。我讲的不是这些东西。我讲的是社会经济统计。当然，社会经济统计不能不受数学发展的影响，韦伯斯特大词典1916年版和1961年版中统计的定义就有变化。待商务印书馆把百科全书中的统计条目的内容查来以后，我还想看看前后不同时间内有哪些变化。北京市统计学会给我的这本统计书也谈到统计的含义在历史上所发生的变化。从字源来看，统计这个词，最早是从状态`stato`，演变到国家`state`，又演变到对国家的一些事情的研究，到后来又把它看成是政治算学，一直演变到现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些演变的过程。这本书所接受的观点是：统计是用数字来表述社会经济现象的一门科学。这里说得不太明确，倒底统计是一门社会科学还是一门数学。用数字来表述社会经济现象，那也是数学的任务，也可以变成一门数学呀！统计到底是属于社会科学还是属于数学呢？当然在分类中会有交叉的现象，但总有个主体。第二个问题：统计如果算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与理论经济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本书里讲的统计定义，与理论经济学分不清楚。你说统计是通过数字来研究规律，那理论经济学也是要讲这个的。政治经济学也研究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不是讲了许多数学吗？但不能把它叫作统计学。还有一点：利用统计资料来研究问题，也不是统计学。研究经济史要利用许多统计资料来研究经济

情况，但它不是统计学；研究经济统计资料，从中得出规律，也不是统计学。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列了许多统计表，但不能说它是一本统计书籍，是不是？

那么什么叫做统计学呢？我自己杜撰了一个定义，等一会儿我还可以翻出来念一念，看行不行？我考虑，社会经济统计是一门社会科学，经济统计可以算是一门经济科学。经济科学的这个门类和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在哪里呢？说到这里，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这个说法也受到钱学森同志所写《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这篇文章的启发（我是在1980年11月5号的《新华文摘》里看到这篇文章的）。我想把经济科学分为两大门类：一是理论的经济科学，一是实用的经济技术。理论的经济科学专门研究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实用的经济技术专门研究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它们研究的内容恰好相反，所以彼此分开。

理论的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是人们不能影响，不能改变，对它毫无办法的。我不赞成提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或发挥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这一类的说法。我认为这些提法都不对。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无法发挥它，也无法限制它。人们对于客观规律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在物理学中，我们从来不说发挥万有引力的积极作用或限制万有引力的消极作用。万有引力的作用丝毫不能减少，也丝毫不能发挥。人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作用毫无办法，不能减少这个作用的一分一厘，一丝一毫。我们对这点头脑要清醒。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很爱看平江不肖生写的《江湖奇侠传》。什么飞剑啦，一道白光啦，当时看得津津有味；里面说有一个人本领非常大，能抓住自己

的辫子（清朝人都梳辫子）把自己从地上提高一尺。这实在是荒诞无稽，实际上完全是不可能做到的。这违反物理规律。自己提自己，在地面和你的身体之间不能产生一点排斥的力。客观规律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黑格尔在《小逻辑》这本书里说过一句话，马克思很欣赏，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中，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先后两次引用。黑格尔的原话我不去念它，意思是说，理性有多么强大，就有多么狡猾。理性，就是意志，翻成我们唯物主义的语言，就是人的智慧。就是说，人的智慧有多么强大，人就有多么狡猾。怎么个狡猾法呢？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利用自然界的事物，使它们相互发生作用，而他自己却不参加到这种自然过程当中去。例如，人们把食盐放进电解槽，通了电，阴极出氢气，阳极出氯气，槽里出现氢氧化钠（就是烧碱）。你看，人没有跳进电解槽去参加电解的过程，而是站在电解槽的外面，但他利用了电解这个自然过程，得到氢气、氯气和烧碱。黑格尔说，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就要征服自然界。但自然界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反抗是很强烈的。人只有采用一种办法，就是利用自然界来反对自然界。煤属于自然界，水属于自然界，铸造锅的铁也属于自然界。人为了要喝开水，就用煤来烧水，用煤去反对水，用自然界来反对自然界。人要喝开水，自己不跳到锅里，也不跳到锅底下去当燃料烧，他只是把煤、水、锅安排在一起，让它们相互反对。他在那里挑拨离间，挑拨煤来反对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人真是够狡猾的。所以黑格尔说，理性有多么强大，就有多么狡猾。

理论的经济科学就是专门研究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

观规律。比方说，“四人帮”可以反对按劳分配，我们可以贯彻按劳分配，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你不搞按劳分配，生产必然要受到破坏。这是客观规律。“四人帮”改变不了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也改变不了这个客观规律。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也是做不到的。你就是天天练功，天天提你的辫子，最多只能把头发拔掉，也不能把你自己从地面提高一尺。但人要有作为，要学会一套实用的经济技术。经济技术的内容十分广泛，包含订战略，做决策，订计划等一套。我主张，搞经济科学的人，百分之九十的人力搞经济技术，百分之十的人把客观经济规律研究清楚，这个比例差不多吧。搞经济技术不简单，要善于把经济工作组织起来，要有一套艺术，这里面学问大得很。其中有一项技术是统计学。统计学就是要采用一套方法，建立一套指标，来把社会经济的现实表述出来。这种表述不是一般的，而是围绕着一一些特定的目的。学问就在这里。北京市统计学会给我的这本统计书，由许多大学的老师编写，你们国家统计局还指导、帮助。我觉得你们应该象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一样，把前人一些好的东西吸收进来，在你们关于统计学的定义中也应该把前人一些好的东西吸收进来。比方说，前人说过，统计是研究国家的事情的，这一点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映。我们现在研究整个社会或者是社会里某一个单位，某一现象。历史上关于统计的含义就适用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又如过去有些统计学家说过，统计要研究事实，我们就可以从事实里做文章。统计接触的是事实，反映的是事实，它是看得见、摸得到的。统计不研究抽象的东西。统计学里没有价值的概念。价值是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可以理解，可以掌

握。在研究统计的时候，我们要领会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这个概念，但谁也算不出价值，至少是现在算不出来。1968年的捷克的副总理奥塔锡克说，现在有些国家在愚蠢地计算价值。我看他说得差不多。价值在理论上探讨探讨可以，真正算没什么意思，至少现在是这样。统计要表现的是事实，是直接的现实。它用数字来表述事实，把一个事实表述得很精确。有的事实可以用数字表现，有的事实不能直接用数字表现，还可以想办法把它数量化，确实不能用数字表现的，也不排斥用一些文字来说明。事实不可能是纯粹的。纯粹的就不是事实。统计概念中可能有纯粹的东西，与理论的概念可能一致，但它们通常是不一致的。例如，每月发给职工的钱是什么性质？全都是劳动报酬吗？不是。因为有些钱不是劳动报酬，有些补贴（如月票补贴）就不是劳动报酬。买月票上班，是进行劳动的必需的支出，就理论上说，这是成本。现在发给职工月票，自然把它打入成本。过去有一段时候，不发给职工月票，职工自己掏钱买月票，这部分买月票的钱就理论上说，仍然是成本。因为职工不是把它拿去享受，拿去消费，它只是职工上班进行劳动的必要条件，可是过去统计上把它统计在工资里了。所以统计上的工资根本不是理论上的工资。它们可能有些接近，但不是一回事。奖金又是什么概念呢？现在我们的奖金与它的性质是很不相符的。我不同意说，奖金是超额劳动的报酬。比如现在全勤的，和一个月请假没有达到某个界限的，每月都发奖金，这同计时工资没有区别，把它和原来的工资加在一起就是了。工人在这一定时间内就只进行这一定的劳动，没有再进行别的劳动，所以这样发给的奖金并不是超额劳动的报酬，这一

点看得很清楚。计件工资是按件计算的劳动报酬，全部拿走了，没有什么超额劳动不超额劳动的问题。现在奖金种类很多，节约奖就是节约奖，还有其他多种形式的奖金，都不是超额劳动的报酬。

这本书对统计指标讲得不清楚。一会儿说它是反映社会经济现象数量的特征的范畴，一会儿说它是范畴的具体化。我认为经济指标不是范畴。范畴是客观的，是从客观世界里概括出来的，指标是我们主观去建立的，是我们考虑可以改变的。范畴与指标的性质不同，它们不是一回事。我们把统计学看成是一门实用经济技术，它是一套科学，是系统的科学知识，要有理论的基础，但它本身是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包括的方面很广，其中的一方面就是要想办法把资料搜集起来，加以分类，加以整理，加以分析，提供给社会，为各个方面服务。例如，为树立一个目标服务，为实行管理服务，为制订政策服务，为理论研究服务。统计是要把社会经济现象尽可能精确地表述出来，它按照不同的目的，来设计不同的统计指标。统计指标是能够算得出来的，从数量上说，是说得清楚，看得见的。所以我说统计的东西和理论的东西不是一回事。现在我们为了研究政策，实行管理，就要考虑建立一套统计指标。这里面学问很大。有些统计指标现在还没有建立，还没有进行统计。比方说吧，为了我们的战略目标，为了更好地树立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应当有些什么样的统计指标，我最近是有些具体想法的。我们开了两次战略问题座谈会，会上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一个是传统的发展战略和变通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的发展

战略当然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因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嘛。所谓变通的发展战略，就是新的发展战略，也就是考虑是不是不采用传统的发展战略。传统的发展战略，是把追求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主要目标，来赶超发达国家。是不是可以不采取这种发展战略呢？现在，我们把上面所说的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一个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一个是对过去许多国家采用的把赶超发达国家的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发展目标的经验作一个回顾，加以讨论。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现在有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把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赶超的目标，对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体现还不够充分。因为，可以看得很清楚，象波兰，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据说已达到三千多美元，可是它并没有解决人民需要的问题。另外，赶超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有两大缺点：第一，统计表明，要在这个方面去赶超人家，我们每年不是跟他们接近一点，而是隔得更远一点。这是必然的。因为一个全年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达一万美元的国家只要增加百分之一，就可以增加一百美元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全年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达五千美元的国家，只要增加百分之二，就可以增加一百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我们中国现在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一年要增加1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就要增加百分之四十才行。一年增加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是可以做到的事，一年增加百分之四十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年年说赶超，年年做不到，年年落后。如果不了解情况也就算了，如果了解了情况以后，还要把这作为目标，那怎么能鼓励人们上进呢？第二，把赶超按人口平均

的国民生产总值摆到第一位，就把人民需要摆到第二位了，许多生产线就去追求生产产值高的产品，而不能很好注意生产人民需要的产品。我认为，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是要讲的，这是客观的嘛。今天我们赶不上，若干年后会慢慢赶上去的。因为我们基数越大，条件就会不一样。但不能把它提得非常高，提为唯一的目标，因为真正的发展战略是很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

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是要发展那些对人民有实惠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满足虚荣心的东西。在美国，有些人一辆汽车还没有坏，就只因为邻居有了新的汽车，就想要淘汰自己的汽车，买辆新的，因为不这样，就丢脸了，就不能和邻居取得同等的社会地位了，就不好办事了。这就是讲虚荣心，而不是讲实惠。我到杭州，看到林彪过去盖的那个叫作704的很豪华的房子，两层楼，一万平方米，那里就只住四个人。从使用来说，是很不实惠的。一个人几公升体积的肺活量，一天要多少新鲜空气，这都是算得出来的。要那样大的房子没有实际的用处，只是摆阔气罢了。资产阶级生活中有些不实惠的东西，你追求它干什么？所以我主张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消费还有目的。这里我引用恩格斯的话，一个人的消费的目的，一曰生存，二曰享受，三曰发展。就这三条嘛，那么跟外国比，就比这三条，行不行啊？

讲生存，我主张把卫生统计摆到重要地位。我主张用四个指标来反映生存的情况：一是婴儿死亡率，二是平均寿命，三是国民体质，四是健康日率（全社会全年中有几天是健康的）。我想用这几个方面跟外国比比，怎么样？

比发展，怎么个比？是不是可以比以下四个指标：一是

识字率，二是义务教育率，三是每千人当中的大学生数，四是每千人当中的专家数。

比享受，怎么比？是不是可以比旅游，比电视机等消费品的数量，还可以比闲暇时间。闲暇时间就是一天当中扣除劳动时间和生活必需时间以后用于享受、用于发展的时间，也叫自由时间。排队买菜的时间不是闲暇时间，挤汽车的时间也不是闲暇时间。看电影和读书的时间可以算是闲暇时间，因为它是用于享受、用于发展的，是表示社会进步的。

我们把这样一套指标搞出来，和外国人比一比，我们中国到底排在第几位？比我们好的是谁？我们好往前去追赶。这种计算是比较困难的。另一种与这有关的计算，就是计算生产出来能够用于生存、用于享受、用于发展的物质与劳务。第三种计算就是生产能力。这三种计算，一种比一种直接，因为有这么多的生产能力，不一定生产这么多可供消费的产品，有这么多的消费品，不一定就消费得很好。要消费得好，一定要有消费品，要有消费品就一定要有能力。这三种计算都表现经济水平。这是发展战略目标的一个方面。

发展战略的第二个方面是经济实力。实力和水平不同。水平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力不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一个小的国家与一个大的国家水平相同，但实力不同，小的国家实力小。实力也不等于这个国家生产出来的全部数量，因为有些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不能构成实力的。例如，生产出来的食品，给没有劳动能力的残废人或老人吃了，这是必需的，但这些人吃了干不了什么事，构不成力量。实力是能够动员出来可以跟外国人较量的一种力量。就象煤里的能量能

够动员出来，而石头里的能量在目前条件下难以动员出来一样，有的力量是可以动员出来，有的力量是不能动员出来的。实力是可以动员出来，干些事情的力量。

发展战略的第三个方面叫活力。两个具有同样经济水平的国家，一个处于蓬蓬勃勃不断发展的状况，一个处于停滞、衰退的状况，那么我们就说前一个国家的经济有活力，后一个国家的经济没有活力。从一年的数字中看不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有活力，但从几年的数字中，从几年的发展趋势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们希望到本世纪末我们中国的经济要有一定的水平，要有一定的实力，要有一定的活力。这三个方面就构成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

为了适应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样一个发展战略的需要，就要建立一套统计指标：反映水平的指标，反映实力的指标，反映活力的指标。反映水平的指标，我刚才说过，又要有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标，反映消费构成的指标，反映生产能力的指标。要建立这样一些指标，就要进行许多讨论和研究，建立起来以后，还要通过实践的检验。因为统计和别的不一样，不是讲一点道理就可以，而是要能够做得到，能够用数字把现实表述出来的。统计指标有它的理论基础，如何建立，本身是个技术，是要有所选择的。例如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应该选择什么指标来反映呢？外国有一个 ASHA 指标，他们就是选择婴儿死亡率和平均寿命两个指标来反映的。用这两个指标反映是不是充分，可以考虑，我想再加一点别的指标也好。发展水平 ASHA 只选识字率一个指标来反映，这肯定不行。因为这只适合于两个发展中国家来

比。光有这一个指标，我们就只能和印度、巴基斯坦及一些非洲国家比。比了个第一也算不了什么，因为目标订得太低了嘛。所以要反映发展水平，我们一定要有一千人当中有多少大学生，多少专家这样一些指标来补充。因此指标的选择十分重要。比方说，闲暇时间，应该充分考虑它的重要意义。人有爱活动的本性，你有时间给他，他就可以提高自己的才能，进行各种改革。如果一天到晚累得要死，他就不能学习，不能享受，以后就难于提高。许多产品的生产，目的就是为取得闲暇时间（或者叫作自由时间）。生产洗衣机的目的无非就是节省洗衣的时间。生产汽车的目的无非就是节省跑路的时间，节省下的时间可以用来看书，看电影。美国经济学家托比说，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指标的缺陷之一就是不能反映闲暇时间。这是对的。物质产品是一回事，闲暇时间又是一回事。有电影，而没有看电影的时间也枉然。谁去看电影呢？如果我们重视闲暇时间，就会爱惜别人的时间，把别人的时间耽误了，就是伤害别人的生命——谋财害命，因为生命是由时间构成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再讲些具体的问题。举个例子。我有一个稿子，送给《光明日报》发表去了。我提出对环境应该计量的问题。我们生产出产品，这是我们的成绩，但把环境破坏了，算不算损失呢？如果为了生产木材把整个山都砍了，我们是否应该计算一下对环境破坏的损失呢？照道理，对环境的破坏，也应该讲清楚。又比方说，我们生产出大米，人们吃了大米，有营养，这是很大的成绩，但大米里面有农药等有害的物质，是不是应该从成绩中扣除？从效果来看，我认为应该扣除。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中不表现环境污染的问题，这也是外国人

讲的。最近日本朋友给我送来许多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讲森林公益的计量，他们谈到不砍森林有什么好处。据我看到的材料，日本、芬兰等国家都有这种计算，他们的计量方法，有些还是有点意思的。日本林野厅计划科写的这篇文章说，森林有好多机能，其中的一个机能就是能涵养水。日本全国森林可以涵养444亿吨水，相当于东京都市民用水的小河内水库的235倍。如果没有这些森林，蓄积水量要用水库来代替的话，一年就得花16,000亿日元。根据他们计算的结果，日本全部森林的总金额达12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72年的全部财政支出。他们的计量方法，我们可以参考，当然我们不是一定要采取这个方法。但是总要算这笔帐才行。过去只计算砍伐木材的成绩，没有计算破坏环境的损失，通过宣传，实际上是鼓励砍伐森林，造成了“吃祖宗饭，砸儿孙碗”的情况。同样，也应该计算改善环境的成绩。所以我写了《环境计量法》这个稿子，第一稿曾送给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李超伯同志看，他很赞成我的意见。从这个例子来看，我们有许多工作（包括环境工作）都涉及到统计工作，统计工作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现在我们从理论上，从学术上来探讨统计学中的问题还不够，这当然也很难怪。我曾经说过，国家机关分两类，一类叫权力机关，一类叫智力机关。我们的权力机关该有的要有，现在还有些应该由权力机关管的事还没有由权力机关来管。但权力机关应该精简，智力机关应该健全。我认为中国的情形是权力机关臃肿，智力机关薄弱。象统计机构是相当薄弱的机构。1979年我到匈牙利去访问，匈牙利的人口当时是1,069万人，而它的中央统计局有一千多人，平均一